



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

清代後期教育論著選

(上冊)

周谷城題



陳景磐
主編

呂達
副主編
田正平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

清代後期教育論著選
上冊

陳景磐
主編

呂達
副主編

田正平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3 號

本叢書係

全國教育科學研究規劃重點項目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承人民教育出版社資助出版

中國古代教育名著叢書
清代後期教育論著選(上冊)

陳景磐 陳學恂 主 編

呂 達 田正平 副主編

叢書責任編輯 呂 達

本卷特約責編 殷夢霞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裝

*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9.75 字數 433,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840

平裝本 ISBN 7-107-11040-3/G·2992 定價: 26.30 元

精裝本 ISBN 7-107-11041-1/G·2993 定價: 31.20 元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前言

爲了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在一九八三年十月舉行的首次會議上，決定整理出版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並於一九八四年三月組成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負責組織整理和編輯本叢書的工作。

中國教育源遠流長，有關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教學經驗等方面的論著及散見於各種典籍中的教育文獻頗爲豐富，是世界教育科學中的一份寶貴財富。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爲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取精用宏，搜集上起金文甲骨，下至清朝末年各種典籍中的教育文獻資料，包括教育理論、教育制度、科舉、書院等。各種政治傾向、不同學派和觀點的文獻資料，凡是確有教育史料價值的，均將廣泛搜集、有選擇地收編。編輯時，根據文獻性質和教學科研的要求，分別採用選編、輯佚、標點、校勘等形式，必要時酌加注釋，以分卷形式陸續出版。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由有關院校的專家

學者共同完成，一些出版單位也給予寶貴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編纂這樣大規模的教育文獻叢書，在我國還是第一次，缺點和錯誤一定不少，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附言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一九八六年五月

（一）本叢書係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本叢書編委會工作，一直得到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指導。

（二）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編委會原主任委員陳景磐教授於一九八九年底逝世。根據工作需要，編委會作了必要的調整。

（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貫大力支持本叢書出版，並撥款予以補貼。原社長兼總編輯葉立羣教授，現任社長張健如教授、總編輯吳履平教授，以及有關室處，都極為重視此項工作。

（四）本叢書由於各卷文稿和出版時間參差不齊，排印體例與技術或有不一之處，敬請鑒諒。

一九九四年一月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顧問：熊承瀚 楊榮春

主任委員：王炳照

副主任委員：李國鈞 尹德新

孫培青 呂達

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注*者爲常務）

*王彬 *王炳照 *尹德新

*呂達 *李國鈞 吳宣德

邵祖德 馬秋帆 高時良

*孫培青 喻岳衡 趙家驥

秘書：王彬（兼）

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說明

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是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中的一類叢書。編纂本叢書的目的是：爲了搜集、整理和保存我國古代教育論著，以便研究我國古代教育思想、理論和措施，發展和繁榮我國的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爲了批判地繼承我國的教育文化遺產，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爲了充實師範院校教育學科師生的教育讀物，提高該科教學的理論水平，爲了使讀者了解我國源遠流長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增強民族自信心，培養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情操，爲了給國外教育學界提供中國古代教育一種系統的研究文獻。

編纂本叢書的指導原則是遵循馬克思主義思想，實事求是，廣泛搜集文獻，認真選材，做到「取精用宏」。

編入本叢書的內容，有歷代教育家的教育論著，也有歷代封建帝王、思想家、政治家、政論家、文學家、科學家等人有關教育的文告和論著，以期能夠如實地、比較全面地反映出我國古代教育理論的水平。範圍大致如下：一、反映當時的教育學術水平，對當時和後代教育影響很大的，二、有

一定教育理論水平，對當時和後代教育影響較大的，三、對當時和後代教育雖無太大的影響，但是確有獨到見解的，四、總結當時教育經驗，反映當時的實際教育情況的，五、對當時教育（包括科舉）的意見、建議和批評等，六、哲學方面人性論、認識論、道德論等與教育、教學原理有關的論著。

論著叢書按朝代編纂成冊，計有以下十卷：

先秦教育論著選；

秦漢教育論著選；

魏晉南北朝教育論著選；

隋唐五代教育論著選；

北宋教育論著選；

南宋教育論著選；

遼金元教育論著選；

明代教育論著選；

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

清代後期教育論著選。

每卷根據教育文獻的多少，分別編成一冊或幾冊。每卷都有編者的話，介紹該卷的大致內容與

編選情況。

這些教育論著絕大部分是屬於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也有屬於奴隸制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它們所反映的教育思想，必然打上時代的、社會的、階級的烙印。對其中的內容，編者未加評論。讀者在閱讀和運用本叢書的文獻時，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剖析，以便去粗取精，古為今用。

本叢書的編纂工作，得到各有關單位和同志們的關心和協助，各卷的主編和編輯同志為組織和參加這一工作，付出了辛勤勞動，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葉立羣同志積極支持和促成本叢書的出版，該社有關部門的同志如呂達同志等認真做好本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對此，我們一并表示謝忱。

著名歷史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周谷城副委員長為本叢書各卷題寫書名，謹致衷心的感謝。本叢書采用了解放前後整理出版的古籍版本，對這些古籍整理者和出版單位表示謝意。

由於編者的水平所限，以及其他原因，叢書的編選工作，一定有不妥和失誤之處，敬請讀者予以指正！

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一九八六年五月

編輯體例

一 我國古代教育論著往往跟其他論著混在一起，需要加以抉擇取舍。因此，選材時，如果全文涉及教育的就選了全文，如果只有一段講教育，盡量選自然段，一般不作語錄式的摘選。如有刪節，不用刪節號，中間空一行來表明。

二 教育論著跟其他論著有聯系的，如倫理教育與倫理學、審美教育與美學、音樂教育與音樂理論等，這些方面涉及教育的就選，不涉及教育的不選。

三 有些著作，經後人考證，對作者確有疑問。但是這些書也反映了當時或稍後的教育情況和思想，還是入選（如孔叢子），只列出書名，不寫作者，在書的簡介里說明。次序按論著內容或成書的時代排列。

四 論著按朝代劃分，但論著作者為後代人，所著前代正史中論述教育的文字，收入前代的論著選。如范曄著後漢書儒林傳，收入秦漢教育論著選，而不收入魏晉南北朝教育論著選。如果不是在正史而是在一般著作中論述前代教育的，如馬端臨在文獻通考、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論述前代教育的論著，仍編入他們所生活的朝代的論著選。

五 論著一般以作者生年爲序，生年不詳，參照卒年，生卒年都不詳，參照其活動的時間。如果作者的生年在某帝王的生年之前，但是他的教育論著寫作在這帝王在位的時期，排列順序適當加以調整。

六 原文有篇目的用原篇目，沒有篇目的根據原書敘述或內容擬篇目。

七 原則上按原書的字排印，避諱字（包括缺筆字）改正。有些地方有脫誤或衍文，仿照史記標點本點校體例，參考有關文獻，認爲應刪的刪去，但保留原字，加個圓括弧，用小一號字排，認爲應加上的加上，加個方括弧，以便識別。

八 標點符號照一般用法。引文加單引號：「……」，引文中還有引文的加雙引號：「……」。書名、篇名用書名綫~~~~，人名、地名、朝代名等用專名綫——。

九 爲了使讀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在每人論著前面寫作者簡介。有些論著用書名，如鹽鐵論、白虎通等，寫書的簡介，並介紹書的編者。

十 秦以前論著酌量采用古注。秦漢以後的論著一般不加注釋。根據最新整理過的標點本（如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漢書等）排印的，不加校注。如果根據以前的其他版本排印，文字出入較大的酌加校注。文中用注釋或校注的一律采用篇後注。

十一 文獻出處在論著後注明。第一次出現，寫作者、書名、卷數、篇名、出版單位和出版時間，例如：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以後引自同樣的書，就不再詳細列舉了，例如：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如果是前人輯佚的論著（如嚴可均輯佚的文獻），除了照原書注明原來的出處外，還寫明錄自何書。

十二 論著如果只選用一段或幾段，寫明「節選」。一本書的各篇如果都是選用的，在書名下寫「節選」，如果有些篇全用，有些篇選用，在篇名下寫「節選」。

本卷編者的話

清代後期教育論著選是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的最後一卷。本卷選輯了從鴉片戰爭開始至清代滅亡的重要教育論著。需要說明的是，由鴉片戰爭開始的清代後期，社會性質已發生了變化，我國由封建社會逐漸演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因此通常把清代後期劃入中國近代的範疇。而這裡之所以把清代後期教育論著選收入中國古代教育論著叢書，是根據有關方面的規定，爲了保持清代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完整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考慮到清代後期的許多重要教育家仍活躍在民國初的教育界，也考慮到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前後我國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我們把本卷論著選的下限推延了十年左右，作爲附錄，這一點也是要向讀者說明的。

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軍艦和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長期以來閉關鎖國的封建王朝，面臨着「三千餘年一大變局」。馬克思曾經深刻地指出：「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二）。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開始了深刻的、艱難的、然而卻是不可阻止的變革過程。傳統封建教育制度、教育觀念的逐步解體，新式教育的產生、發展，新的教育觀念、教育

理論、教育思想的萌發、形成，正是在這一廣闊的背景下展開的。具體來說，受着兩大基本社會條件的制約：

一是鴉片戰爭以來，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在短短的八十年間發生了急劇而深刻的變化。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由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而引發的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辛亥革命所導致的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崩潰；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民族資本主義短暫的「黃金時代」，等等，幾乎每一次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的較大變動，都成為中國教育思想史上重大的教育思潮、教育理論、教育學說賴以產生的觸發點，有時甚至是直接促成了一代教育家的成長。

二是鴉片戰爭以來，中西文化以空前的規模和深度，在不同層面上廣泛進行的接觸。儘管這種接觸有融合，也有排斥，有互相吸收，更有互相對抗。而且，事實上，相互間的抵制、排斥、對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顯現為主要方面。但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來說，由此而引起的變化，八十年來，同樣是急劇而深刻的。

由於上述兩個基本社會條件的制約，清代後期教育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它的內容和形式，從宏觀上看，呈現出如下一些鮮明的特點。

一、傳統教育理論的一些基本範疇和思維模式受到冷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由強烈的愛國激情

作動力的教育救國思潮。

翻檢清代後期教育家的論著、演說、文稿，我們就會發現，從孔子以來，歷代教育家們所長期討論的一些基本的教育理論範疇，比如說關於人性的理論，關於教學的理論，關於學習的理論，關於師道論，等等，在這一時期，很少有人論及（當然不是說沒有人討論），相反，撲面而來的，是一股救亡、圖存、保國、保種的強烈的憂患意識。振興國勢、挽救民族危亡，成了絕大多數教育家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張、理論、學說的立論依據，成了貫串於清代後期教育思想發展史的主旋律。這種狀況，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前後，表現為經世致用教育思潮的勃興，如龔自珍、魏源的有關言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又以早期維新思想或洋務教育思潮的種種形式出現，如馮桂芬、王韜、鄭觀應、薛福成、郭嵩燾、李鴻章、張之洞的有關言論，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教育救國的呼聲大振，並且具有了明確的資產階級理論形態，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的大量教育言論，就是在民國成立後的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仍然歷久不衰。可否這樣認為，清代後期教育思想的產生發展，與救亡圖存有着緊密的聯係，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換言之，即是說，清代後期教育思想的產生發展，受這一時期政治的影響更直接更具體。

二、清代後期教育思想的内容，圍繞着學校與科舉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而展開，呈現出破壞多于建設、批判多於創新，新舊并存、中西雜糅的特色。

在晚清文化史、晚清教育史上，學校與科舉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是一個既新

鮮又陳舊的老問題。它始終強烈地吸引着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們的關注，幾十年來爭論不休，留下一條清晰的軌迹。大致說來，那些政治上比較開明，思想上趨於進步的人們，在爭論中往往站在學校、西學、新學一邊，而那些政治上比較頑固，思想上傾向保守的人們，則自覺不自覺地維護着科舉、中學與舊學的神聖地位。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隨着國家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兵戰」、「商戰」的步步敗北，引起人們對「學戰」的普遍重視和對傳統封建教育的深刻反思。「國家衰敗在於人材匱乏，人材匱乏在於教育不振」，這樣一條邏輯推理幾乎成了近代教育家們的思維定勢。人們把滿腔的悲憤傾瀉於以科舉制度為核心的傳統封建教育。如果說魏源「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海國圖志叙）的呼吁，馮桂芬的改科舉議還顯得比較溫和、有點改良主義色彩的話，那末，到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志士們的討伐就顯得鋒芒畢露、火藥味十足。康有為憤怒地指出，中國之割地賠款，非它為之，乃由八股為之。梁啟超告誡國人：「惟學究足以亡天下」（變法通議）。嚴復則在歷數八股取士鋼智慧、壞心術、滋游手的種種弊端之後，斷言：「救之道當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則庶乎其有鳩耳。東海可以迴流，吾言必不可易也。」（救亡決論）都表現了與傳統封建教育決裂的大無畏氣概。這種批判，在科舉制度被廢除十餘年之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非但没有減弱，反而一發不可收拾。狂飆迭起，怒濤冲天，矛頭所向，舉凡舊倫理、舊道德、舊觀念，統統都在橫掃之列。對傳統封建教育的觸動和震撼，又遠遠超出了戊戌變法時期，由物質的、制度的層面，深入到精神的、心理的層面。可以說，晚清以來，傳統封建教育，從形式到內容，一直處於被討伐、被鞭撻的地位，換言之，對舊教育的批判，始終是晚清教

育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

與上述批判和破壞相比較，晚清教育家們在理論上的建樹和創新就顯得要貧乏一些。政治上的義憤當然不能代替學理上的探究。救亡圖存的迫切任務，使得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較長時期地直接從事於教育實踐活動，更沒有時間和精力構築自己的教育理論體系。而只是匆匆促促地把從西方、從日本接觸到的各種理論、學說，還沒來得及認真理解、消化、吸收，就迫不及待地介紹給國人。對舊教育的憤慨，使得他們對傳統教育中具有民主性、科學性的成份也採取了否定的態度，使得他們從國外看到的、聽到的、學到的新理論、新學說缺乏一種中國化的內在媒介。因而，他們的理論、思想，往往表現為中西雜糅而不是中西交融，是新舊并存，而不是推陳出新。駁雜而失之膚淺，缺乏理論色彩，往往是沖擊破壞之力有餘，而扎根、持久之勁不足，來之既速，去之亦快。所以，晚清教育家作為一個群體，儘管人材輩出，各領風騷，許多人的理論學說不乏真知灼見，但是，沒有造就和培育出在教育理論的系統建樹上具有世界影響的大教育家來，這亦是時代使然。

三、清代後期教育思想的發展，表現為波浪式的推進態勢。這里借用「波浪式」一詞，主要想說明兩層意思。第一，一種教育理論、教育學說，抑或是一種教育上的新觀點、新主張，從醞釀到提出，到初潮、漲潮，形成高潮，然後是落潮、退潮，以至消聲匿迹，波浪形的軌迹非常明顯。第二，是取譬於波浪的變動不已，一浪接一浪，一浪推一浪，一浪趕一浪。在晚清乃至民初教育思想史上，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短短幾十年間，先後有所謂經世致用教育思潮、西語西文教育思潮、西藝教育思潮、西政